



《柳如是别传》 的话语研究

林 燕 著

言如字之者 流音
大喜曰天下有懷 以
能才如柳者不聚 汶柳
為我問室十日 落成
日裁社畢 淚 後 未
寒此 柳花如夢裡向
君不 關桂室
美新 歌王叔喜極而打
港下 年 上 六



科学出版社

《柳如是别传》的话语研究

林 燕 著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家陈寅恪的语言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YBA310）

吉首大学 2017 年度学成返校博士科研资助经费研究项目：“《柳如是别传》的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jsdxxcfxb skyxm201706）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陈寅恪先生所著的《柳如是别传》为研究对象，从叙述学、互文性和历史话语等方面探究《柳如是别传》中的历史话语、叙述者的经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互文性关照。首先，本书通过解读陈寅恪先生对历史事件之考察，从叙述学角度探讨《柳如是别传》的语言特征，从语言风格来分析历史文本，为“颂红妆”之说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支持；其次，本书从互文性的角度分析《柳如是别传》中的隐语和典故，解读《柳如是别传》中种种隐晦之语的下之意；最后，《柳如是别传》的话语分析发挥历史话语的现实表征作用，探讨历史话语在本土化重构中的作用，开辟历史文本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当今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

本书适合批评语言学研究者、陈寅恪研究者以及对历史话语分析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如是别传》的话语研究/林燕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03-056312-5

I. ①柳… II. ①林… III. ①柳如是(1618—1664)—传记 ②《柳如是别传》—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3759号

责任编辑: 王洪秀 郭亚会 / 责任校对: 贾伟娟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0 3/4

字数: 210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可成为史学家撰述的素材，叙述历史事件意味着史学家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就是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和社会学话语，历史话语是一种诠释，因为其撰述过程必然涉及史料的筛选、情节的铺陈与解释，其中作者叙述已发生的事情，而非尚未发生之事、可能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话语意义是历史内容所固有的，因此历史话语至少有两层意义：历史学家解释历史上某些特别“重要的”冲突，让人们汲取道德的或政治上的教训；抑或是意义独立于历史话语本身，并由历史学家个人来传达，可以说历史话语本质上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是一个话语的世界，历史文本中的话语方式不仅表明作者的身份，展示作者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而且也是展示作者社会与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

本书并非是讨论《柳如是别传》（为方便起见，以下行文中简称《别传》）本身说的是什么，也不是分析这部著作的内容是否具有史实的真实性，而是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融合跨学科的理论，对历史文本尝试进行语言学分析。我们对社会与文化的认识及对人的研究势必要回归到对语言的分析上，集中到对作品中文本与话语的理解上。《别传》这部历史巨著陈寅恪耗时十年创作而成，是一种“作为历史的话语”文本，是陈寅恪先生从现实生活中的感悟和关切出发，对过去历史的叙述和考据进行批判性考证、整理和加工而创作的，陈寅恪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语言必然会反映在其著作的话语之中。吴宓曾经提出：“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此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状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1958年以后陈寅恪先生为何选择开始撰述《别传》，为何选择了为明清之际的歌妓作传、考据历史事实而没有选择自己擅长的唐代史研究？倘若陈寅恪仅以事件的重要性为依据选择史料，毫无疑问，他对历史事件重要性的解读就蕴含了其个人的主观设想。在撰述的过程中，对史实的考据也常常受到史料的可及性约束，尤其是陈寅恪对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的描写和评述也会引起读者的反思，这部作品究竟是“颂红妆”还是“述心史”？究竟是“还原史实”还是“瞎编情节”？

通过考察陈寅恪诗史互证著作《别传》，窥探其中特别的人文精神并探讨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思想，本书主要有以下目标：第一，结合语境，从互文性理论视角出发，剖析《别传》中今典、古典和西典的阐释，分析作者的“兴亡遗恨”，将古典与今情化二为一，探讨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及其学术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同时，从历史、语境、文本与话语分析解读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既可以进一步实现话语分析理论的整合，也可以充分发挥其跨学科的特性。第二，尝试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角度跨学科地解读《别传》，推求陈寅恪的思维运作，进而说明文、史、哲学科之间相辅相成的本质和相通的共性。同时，从话语分析角度推求陈寅恪史学中的思维运作，为研究陈寅恪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陈寅恪，进一步彰显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魅力及其深厚的学术思想。第三，推进话语分析理论的整合，充分发挥其跨学科的特性，进一步证明语境并非是附属的、可有可无的，话语（文本）与语境水乳交融，话语（文本）脱离了语境，其意义也将丧失。

笔者以《别传》为研究对象，以文、史、哲以及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叙述学、互文性和历史话语三方面探究《别传》中的历史话语与叙述者的关系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本的互文性关照，探讨历史话语在当今社会文化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别传》中的历史话语研究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学作品的特性，解读作者的内心世界，又可以发挥史学著作反观社会现实的积极作用。我们主要探讨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在话语分析的视角下解读《别传》这一历史文本，通过分析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之考察，从叙述学角度探讨《别传》的语言特征，从语言风格来分析历史文本，为“颂红妆”之说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支持，证明陈先生的入情叙述中蕴含了他个人的人生抉择以及他对弱势文人和歌妓的同情与理解之情。同时，在社会现实的启发下结合社会情境和现实语境，更深层次地解读作品的含义和作者的用意、理解陈寅恪及其学术思想中蕴含的朴素的文化史观和哲学观。

其次，从互文性的角度分析《别传》中的隐语和典故，运用语境中诗史互证方法，结合语境剖析陈寅恪诗史互证著作《别传》，尤其是对社会中处于支配地

位的女性与文人的理解与同情，深度解读其中的含义，更好地理解陈寅恪诉诸另类话语方式——用诗作来理解世界并创造意义的原因之所在，解读《别传》中种种隐晦之语的言下之意。《别传》是一部历史文本，其语言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真实的社会语言现象，因此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我们无法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追问言说者或作者，抑或是拷问政府职责之所在。通过互文性解读《别传》，理解并阐释陈寅恪先生晦涩、深奥的语言中蕴含的真实含义与其字面意义存在的不同之处。

最后，我们将聚焦语篇、语境和社会文化视角的语言学理论，对《别传》中频繁用典的现象、故事发生的语境与文本的叙述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在不同语境下探讨典故的意义并阐释其中的言下之意，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更好地理解这部伟大的历史性巨著。同时，解读汉语诗在社会现实的启发下如何结合社会形式和现实意义，分析汉民族语言对汉民族精神的影响。《别传》的话语分析发挥了历史话语的现实表征作用。本书通过探讨历史话语在本土化重构中的作用，试图开辟历史文本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别传》中陈寅恪先生的语义态度以及对当今文化建构的含义，旨在通过对《别传》的历史话语解读，为当今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

从语言学的角度解读陈寅恪的晚年巨著，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探索已有研究中未曾触及的历史大语境，对《别传》进行历史话语分析是本书的创新点之所在；目前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运用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来解读《别传》的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将历史文本与文、史、哲与语言学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展开研究，开创话语分析的一种新途径；本书在跨学科的框架下对陈寅恪的诗作中频繁用典的现象以及不同语境下的典故意义进行阐释，结合语境解读陈寅恪作品中的言下之意，开启对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释诗方法的系统研究，拓展历史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同时，本书从叙述化、语境主义和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对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巨著《别传》进行深层次的解读，通过整合话语、语境主义和叙述化等理论来分析历史语境对诗史互释的影响，最终不仅为陈寅恪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语言与民族健康的健康发展和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持，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之深远含义。而且，本书将从跨学科的角度整合话语分析的理论，从历史话语的角度为话语分析注入新的血液，同时也为中华

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的传承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中外相关文献和专著，笔者对这些文献和专著的作者、对为本书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科学出版社的王洪秀同志和冯晓寅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林 燕

2018年1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理论框架	12
第一节 引言	12
第二节 话语、历史与语境	13
第三节 语境主义	18
第四节 叙述化 (Narrativization)	20
第五节 互文性理论	22
第六节 作为话语的历史	23
第七节 本章小结	26
第三章 《别传》的叙述文本分析	27
第一节 引言	27
第二节 叙述者与叙述语境	28
第三节 《别传》中的叙述者声音和视角	46
第四节 《别传》中的叙述者干预	6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72
第四章 《别传》的互文性分析	74
第一节 引言	74
第二节 互文性的定义	74
第三节 《别传》的互文性研究	77
第四节 《别传》与《红楼梦》的互文性研究	9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97
第五章 《别传》：一部文本与话语的历史	98
第一节 引言	98
第二节 历史、文本与话语	98

第三节 《别传》的话语特征	105
第四节 《别传》中的历史话语研究	12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40
参考文献	142
英汉人名对照表	155
后记	159

第一章 绪 论^①

作为一位闻名于欧美的权威学者，陈寅恪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和校勘学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陈先生（本书中的陈先生即陈寅恪）自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其国学基础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他13岁即游学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后又远涉重洋，前后共有长达18年的时间负笈海外，出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断断续续在亚、欧、美三大洲多所学术机构学习，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系统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陈寅恪的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可以说，在国学的广泛研究领域里，陈寅恪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进行了极有深度的发掘，留下了无数有启发性和开创性的成果。

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谈起中国的学问家，鲜有不知陈寅恪者。英国《剑桥中国隋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英美隋唐史专家在隋唐史方面的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唐史权威专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编在该书的“导言”中高度赞扬陈寅恪，认为他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提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为解释隋唐政治制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部著作得益于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日本专家池田温（1989）认为：“日本近年刊行之隋唐史或中国古代史之著作不胜枚举，而于唐代政治史方面之叙述，不受（陈先生）诸说影响者盖鲜矣。”吴宓1919年在哈佛大学结识陈寅恪，吴宓（1998）在日记中谈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豪爽，志气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又云：“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

^① 这部分内容曾以“陈寅恪的语言思想研究”为题发表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而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萧公权（1972）提出：“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最特出的一位。”陈寅恪虽然在国外留学数年，但是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其志在于求得真才实学、追求真知。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1996）告诉他：“在柏林中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赵元任、杨步伟（1979）说过只有陈寅恪和傅孟真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胡适云：“寅恪治史学，当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谓：“我的朋友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微（钱大昕），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尤精梵藏经典。”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杨步伟、吴宓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学人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评价。称其为“一代宗师”，其的确当之无愧。陈寅恪36岁时，作为“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的留学生，就已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共同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可见其学术造诣之深厚。由于陈寅恪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的显著贡献，陈怀宇（2013b）的研究发现，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该学会研究员职称。同时，牛津大学特聘他为汉学教授，邀请他赴英做特别讲座。1944年陈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7年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由此可见，当时的英美学界已经正式承认陈寅恪是卓越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博学得到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肯定。

陈寅恪在《别传》的“缘起”中提出其创作意图是“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别传》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陈寅恪先生自述“释证之范围及义例”曰：“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陈寅恪在晚年诗文中将《别传》比作“心史”，此意也蕴含于《别传》结尾的“偈语”之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膜足，尚未聋哑。得此成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钱牧斋^①《复遵王书》寄希望于钱曾：“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诗）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陈寅恪，1980：11）然而，陈寅恪（1980：1-15）在考证钱曾所注的《初学集》和《有学集》后，发现三个问题：①“牧斋所用僻奥故实，遵王或未著明，或虽加注释，复不免并误，或不切当。”②“又深恶河东君，自不著其与牧斋有关事迹。”③“抵触时禁，宜有所讳。”因此，陈寅恪认为钱曾之注“殊有负牧斋矣”。在《初学集》和《有学集》中发现了对事实不准确、不妥当之解释，这是陈寅恪自述其著述《别传》的动机之一。

研究明清之史实，倘若舍弃诗作则其他史料实为匮乏，而明清之际翻天覆地的变局，对于一生都处于民族文化备受挑战之境况的史学家陈寅恪来说，举凡与政权之关系（陈寅恪有关思想史的文字只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究竟如何维护华夏文明等，尤堪为鉴。因此，在全书的著述中，陈寅恪详考钱牧斋、柳如是诗句中的古典和今典，融合西典，又动用“神游冥想，钩沉索隐”，终使钱牧斋、柳如是复明真相大白于世，确能“发皇”钱牧斋、柳如是之“心曲”，足当“明眼人”而无愧，这也是陈寅恪先生著述《别传》的又一动机。针对钱曾之失，陈寅恪（1980：1-15）主要采取三种方法进行释证。①今典方面，“详考本事”。②古典方面，“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③融合古典、今典与西典方面：“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

最早高度评价《别传》的是其好友吴宓，20世纪60年代初在吴宓的日记中有近乎盖棺定论式的记载：“陈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

① 牧斋为钱谦益的号，全书统一采用钱牧斋。

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陈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中国台湾汪荣祖（1984：162）认为，从《别传》一书“文学家可欣赏其解诗之精，社会学家可由此得到意外的材料，而史学家更可领会到由诗证史、以史释诗的妙境”。他认为陈寅恪先生晚年倾力撰写《别传》、研究柳如是，其不仅是为了“展现一贯的考证长才”，而且也反映了陈寅恪先生对美女兼才女产生的一种“投射之恋”，陈先生迷恋其研究对象，将自己化身为其中的角色而不能自拔。此种看法较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因而也是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许冠三（1986）认为，《别传》是最值得称道的新猷，就证史法门而言，是语言比较和长编求异二者的融通，别开一历史一语义析证的新途辙。汪荣祖（1989）提出，《别传》并非一本通论性的传记著作，而是无数考证的汇集，属于考证、疏证、考释之类，而不是系统条理的史释。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指出《别传》中有不少失误之处。清史专家何龄修（1989）同意汪荣祖（1984）的观点，指出《别传》集中总结了陈寅恪史学的系统研究方法，让后学末进有所遵循和借鉴，其次是留下了一种典范，一个虽“失明臆足”却“尚未聋哑”（陈寅恪，1980：1224）之老翁进行创作的范例，激励后人。同时何龄修也认为《别传》可以更精简，指出其烦琐冗长的缺点以及陈寅恪古稀之年由于失明臆足，无法亲自查阅文献资料，年老体衰而记忆失误，进而让《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全书占1/3分量的第五章“复明运动”是陈寅恪先生研究的重心，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心迹，然而，主观或者客观的缘由让这一章出现了考证的失误。首先，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史料多有隐晦而且浩如烟海，考据某一具体人物、事迹无异于大海捞针。其次，陈寅恪特别重视著述要“发未发之覆”，推陈出新，主张“旧瓶装新酒”，以免出现过度求证的问题。最后，陈先生暮年失明臆足的身体状况使其无法正常解读文献，这也是导致《别传》第五章考证时出现重大失误的缘由之一。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陈寅恪先生的著述褒贬不一，学者们要么赞扬在《别传》中陈寅恪的诗史互释体现了其学识之精，要么认为陈寅恪先生著述《别传》的缘由是对美女兼才女的“投射之恋”，要么指出陈寅恪先生考证的失误之处。总而言之，学者们鲜有从历史或者话语的角度出发解读《别传》这部“亦文亦史”的巨著，他们的理解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偏颇之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睹学者们对《别传》的研究,有论者认为是陈寅恪“欲验自身所学之深浅”,把“讳忌不敢语、语焉不详”的遗民诗歌当作史料,重建明清之际的一段历史;或谓借以考察当时政治道德之真实情况(蒋天枢,1981:165);或引陈寅恪夫子自道:写《别传》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1980:4);或特著专书,为柳如是辩护,甚至以红妆颂贤妻等,俱各成一家之言。中国香港的李玉梅(1995)则从诠释学的角度提出了“陈寅恪之学固善邵传统,亦兼治外说,实超越其时代,堪供后人殷鉴”,陈寅恪的“历史为体、学术为用”,“由‘纯粹语言’即诗歌到广义的语文学即历史学的理解”和“从语意之理解,通过言志之诗”可以“重建一个人、一个时代”。

1994年9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陈寅恪弟子——胡守为教授为该书撰写的“代前言”中指出:“《柳如是别传》这部皇皇80余万言巨著,虽以名妓柳如是为线索,却论述了明清之际的重大事件,引用大量诗文材料,考释入微,有很多地方发前人所未发,应是陈先生的学术结晶。”这可能是当时大多数《别传》研究者的共同看法,即认为柳如是只是这部书的“线索”,同时这部书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借此反映了“明清之际的重大事件”,发“历史未发之覆”等。该论文集对陈寅恪《别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中国香港的刘健明(1995)认为:“陈先生重视历史人物的行谊与操守,绝不能简单视为道德高于一切的传统观念的坚持,而是肯定历史人物对自身人格的尊重。没有独立的人格,便没有独立的生命和思想。”这是对《别传》很有见地的评价,可惜的是刘健明的文章没有对所述观点进行充分详细的论证和阐释。中国澳门的谭世宝(1995)探讨了陈寅恪先生将《别传》数易其名的缘由以及对钱、柳之抑扬比较,提出钱牧斋在生死抉择问题上忍辱负重是其一生胜于前人之处,钱、柳是同生死共荣辱的患难夫妻。中国香港的马楚坚(1995)主要从“道德文章诗词缘”的角度,以南明史为新径从诗词交往窥探柳如是、陈卧子之恋,探讨陈寅恪先生以“通硕博识创以诗词证史”的研究方法。

蔡鸿生(1995)认为,“要完整地把握陈寅恪的历史观,就不能忽略他的妇女观……一言以蔽之,‘颂红妆’,就是‘颂独立,颂自由’”,“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合”。陈寅恪先生写这部巨著的目的是要“表彰我民族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该论点堪称精辟。王永兴（1993）认为，陈寅恪先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著述《别传》一书，是称誉柳如是一生的志事——抗清复明之志，其目的是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民族气节，他指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目的是阐明柳如是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是反清复明的英雄。姜伯勤（1995）提出：“陈寅恪先生的文史考据之学不能视为一般的实证研究，而在其内蕴中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化中传统价值观念的精神。”他主张从两方面来理解陈寅恪的心史说，一方面是其晚年的历史研究，从以制度、文化为重点的广义文化史研究转向对心灵历史的研究。这一转变与国际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和妇女史的关注是同步发生的。另一方面，陈寅恪探讨柳如是这位伟大女性心灵历史的巨著，也可以看做是体现作者晚年自身心路历程的一部“心史”。胡守为（1995）认为，陈寅恪先生晚年花了10年的时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传世之作《别传》一书的撰写，如果认为陈寅恪先生仅仅是为了某种影射，“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卞孝萱（1995）则概括了《别传》的四大特色，即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笺释诗词：古典字面而今典实指；发现钥匙：明末诗词暗藏姓名；无懈可击：正面论证与反驳疑问结合、传统考据与逻辑推理相结合。这一概括综合了陈寅恪在河东君的真实姓名、其爱情选择及其最终归于牧斋等具体问题的考据上所采取的方法，认为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对后人治学有普遍之指导意义。胡晓明（1997）评述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事实上，这是一部弱势文人的心态史。显然，《别传》不仅展示了时代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而且揭示了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刘克敌（1998）提出，《别传》的“颂红妆”比较了文人的风貌并批判了某类文人如谢三宾等的行径，认为陈寅恪著作的目的就是批判讽刺封建社会某些文人的卑劣行径，这一观点未免过于片面。严耕望（1998）虽然惊叹于陈寅恪的博学和毅力，但是认为《别传》一书是陈先生心中激愤、悔恨之情的表述，是几乎失去理智的无益之作，提出从选题上来说，《别传》除了表彰歌妓柳如是、发泄其一己激愤之外，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卞孝萱（2000）比较研究《桃花扇传奇》与《别传》两书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创作方法，论证艺术作品与史学著作各有千秋，认为这两部作品都无不对封建社会中地位卑贱的妓女表示一种同情，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刘大年（2002）则提出《别传》的史实考据过于烦琐，认为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

生活细节,这种研究方向过于考究,是不值得提倡的(任继愈,2002:201-204)。李圣华(2004)认为《别传》中陈寅恪以万余字的篇幅考证钱牧斋与黄甫及的交游的事迹,认为黄甫及就是徽州人黄澍,并由此推断黄甫及游吴盖,乃系张天禄秘密派遣联络钱牧斋抗清之事,这一系列的推论有欠妥当之处。陈建华(2005)认为陈寅恪在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想象力,重构了一幅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弘扬了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发挥至极致,遂造就这一洋洋80万言之奇作,而且在文本的主题和创作方法上,《别传》一书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丁国强(2008)认为,《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一部“心史”,目的是要通过史学研究来维护其平生一贯坚持的文化价值,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主旨。廖可斌(2011)则认为,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工作之始终。因为陈寅恪先生是感情极为丰富之人,所谓“投射之恋”之类的情感倾向或许可能有,此乃极为次要之处。至于在《别传》中表达了陈先生对现实环境和个人处境的不满等,如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文人的鞭笞等,也不能说没有,因为陈寅恪先生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富于理想主义批判精神,但这些也绝非主要之处。如果只关注此点,就是见木不见林了。

为了缅怀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并纪念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十周年,2013年九江学院召开了“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并于2014年7月出版了论文集《陈寅恪学术研究(2013)》。其中,刘梦溪(2014)提出:“《柳如是别传》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著述,绝对不是简单地为一位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撰写一部明清文化痛史。”刘梦溪(2014)认为《别传》是对钱(钱谦益)、柳(柳如是)及柳(柳如是)、陈(陈卧子)之间的关系的复原、重构,宛若回到大约400年前的历史现场。李凤凤(2014)则认为,《别传》是一部学术研究与人生感喟的合奏,其学术价值在于陈寅恪先生由以诗证史转向以史释诗、文史交融,探究人物、事件真相,同时,《别传》又是由政治制度史转向社会生活史的一部力作。刘梦溪(2015)则认为,陈寅恪是一位贵族史家,其史实考证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和精神,《别传》是一部展现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与信仰的巨著,充

分体现了陈寅恪先生通过学术实践可以重构历史真相的观点。由此可见，刘梦溪的一系列研究认为，《别传》是“明清文化痛史”，其目的是“立传来修史”。然而，完全从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著作，难以理解作者的心境，尤其是他著述的真正旨意。

首先，目前的研究成果探讨陈寅恪历史考据之法的研究有邓瑞（1995）、卞孝萱（1995）、李玉梅（1995）、马楚坚（1995）、汪荣祖（1984）、许冠三（1986）等，他们主要是从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入手，尤其是姜伯勤（1995）以陈寅恪诗史互证的三部主要著作《元白诗证史》《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为依据，进而提出东西方哲人对于诗与史的共通意念，这些研究关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及其对各学科研究者提供的帮助或者是对社会的启示，反映了陈寅恪先生学术研究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作为一部“亦文亦史”的历史巨著，仅关注其“诗史互释”的方法，未免失之偏颇。在汪荣祖（1984）的专著中，他甚至认为陈寅恪撰写《别传》的目的是“辩诬”和“自娱自乐”，其书名由《钱柳因缘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是因为“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同时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扞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以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

其次，蔡鸿生（1995）、谭世宝（1995）、刘健明（1995）、王永兴（1993）、姜伯勤（1995）、胡晓明（1997）等则认为《别传》是一部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进一步发扬了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民族气节，侧重探讨《别传》中值得发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诚然这些研究体现了陈寅恪先生终身追求的宗旨，但是从单一的文化层面来探讨《别传》，难免会造成片面的理解甚至误解。李坚（1995）则从悲剧主义色彩的角度解读《别传》，认为陈寅恪一生的遭遇是导致他悲剧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点可以较好地解释《别传》对弱势文人的同情，反映了陈寅恪先生主张阅读历史应该具有“了解之同情”，但是倘若过分拘泥于此，则会产生一叶障目，甚至产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误解，未免有过犹不及之处。